

南京师范大学
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礼记》成书考

王锸 著



中华书局

南京师范大学
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礼记》成书考

王锸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记》成书考/王锸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3

(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508 - 5

I. 礼… II. 王… III. 礼记 - 文献学 - 研究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0996 号

书 名 《礼记》成书考

著 者 王 锸

丛 书 名 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责任编辑 贾元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3¼ 插页 2 字数 32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508 - 5

定 价 39.00 元

责任编辑 贾元苏
封面设计 王铭基

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丛刊

方向东 孙诒让训诂研究

王 鐸 《礼记》成书考

刘立志 汉代《诗经》学史论

杨新勋 宋代疑经研究

序

《礼记》一书，自唐代初年李世民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列入经书之中，取代了《仪礼》自战国以来在儒家经典中不祧之祖的地位，虽然不久所定科举考试的明经科增加了《仪礼》、《周礼》，且以后的学者仍以《仪礼》、《周礼》为“经”，而以《礼记》为“记”，地位同于“传”，但《礼记》在儒家经书中再未被排除过^①。至清康熙皇帝的《御纂七经》（包括《易》、《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连东汉时通行的“七经”中已经列入的《论语》、《孝经》，以及唐代明经科《九经》以来的《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皆包括在内的“《春秋》三传”都删去了，却保留了《礼记》。我以为唐太宗和康熙皇帝这两位皇帝都看重《礼记》这部书，实在表现了他们既具雄才大略又重文教的不凡眼光。但另一方面，也因为《礼记》被列入《十三经》，很多人便把它

^① 先秦时称儒家经典为“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见《庄子》的《天运》、《天下》。《徐无鬼》中也提到《诗》、《书》、《礼》、《乐》）。但《乐经》失传，故西汉自武帝始只列五经博士。东汉时增《论语》、《公羊传》（见东汉《一字石经》。或曰增《孝经》），成“七经”，故谢承《后汉记》曰：“典学孔子七经”（范晔《后汉书·赵典传》注引）。初唐颁布《五经正义》，以《礼记》为经；不久所制定科举考试科，明经科有《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称为“九经”。《春秋》扩充为“三经”（经文在其中），而《仪礼》、《周礼》恢复了经书的地位。由于唐朝李世民认老子李耳为始祖，尊崇道教，故冷落了《论语》、《孝经》，将其排除在经书之外。唐玄宗亲注《孝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刻十二经，在原九经之外，增入《论语》、《孝经》、《尔雅》（以《尔雅》中广释诸经中词语，为最早的训诂书，可以统一诸经的训释）。五代后蜀主孟昶石刻十经，不去《孝经》、《尔雅》，至宋代，将以前曾列入经书之各书全部纳入，增加《孟子》成“十三经”。大抵各时代之去取，均有政治上、社会风气上的原因，此处不多说。而《礼记》自初唐人“五经”之后，虽时间不长，《仪礼》、《周礼》补入，学者们一直视《仪礼》、《周礼》为经，而以《礼记》为“记”，但再未被排除在儒家经书之外。

看得很神秘,很艰深,认为这部书所讲理论距现实生活、距自己很远。尤其,经学之中,礼学又被一些人说为“绝学”,强调从事礼学研究一定得有“师承”,无师承者不得其门而入,入之也不得其道而出。以此之故,多不敢涉足此领域。我以为,今天我们应该扭转对《礼记》这部书的看法,把它从“经书”的神位上请下来,让它同一般的文化典籍一样,让人们随意去接近它,了解它,批判其中所包含的封建思想、宗法观念,而继承、吸收我们的祖先在千百年中形成的伦理道德、人生经验,丰富我们的思想,和谐人与人的关系,纯洁和美化我们的行为、言语,建设与二十一世纪世界潮流相合又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社会风尚。

儒家从孔子而成为先秦时代一个重要的学派,以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关心现实、重视民生、重视伦理、重视教育、重视实践,统治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两千多年。但孔子以前,最早的儒生主要是从事祭祀、婚丧等的相礼活动(其后之儒生仍有只停留在这个职业范围之中者,孔子称之为“小人儒”)。孔子远承周初大思想家周公旦的“敬德”、“保民”、“明法慎罚”、“作稽中德”、“孝养父母”、“以德辅天”等思想,形成儒家学派,周公制礼作乐的重大政治举措也深深地印入当宗周凌夷之际希望挽回颓势的儒家理论之中。孔子年轻时曾适周向老子问礼^①,但后来未接受老子的思想而远承了周公的思想,这一点他是进行了深入考虑和认真选择的。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纵观三代的兴亡盛衰,认识到天命靡常,唯有德者能保,故继承周公的思想,而加以弘扬、丰富和发展。至孔子之时儒者才有了自己的学说,成为有思想的士人,从而也才形成了一个学派。但一则儒者并不能马上都进入统治阶层,参与国家的管理以实现政治主张,有些人

① 《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老子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云云。《礼记·曾子问》中也说:“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云云。《孔子家语·观周》述之更详。

还得从事原来儒者的工作；二则制礼作乐是儒家维护社会秩序、企图恢复西周盛世的重要手段，所以，孔子之后儒者仍然一直很重视礼。可以说，重视礼、礼仪，是儒家的传统。《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小时“为儿嬉戏，常设俎豆，设礼容”。这正是说他从小就以当儒者为理想。“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对太庙中的很多陈设和设置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因为这都同礼有关。他适周问礼访乐，历郊庙，考明堂，察庙朝，“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胡仔《孔子编年》卷一）所以，孔子以《礼》为儒者必读的书，礼为必习之业，其后的儒家论著中，涉及礼的内容很多。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孔子击磬”，“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他仍然保持着儒者本来的职业特征，只是他已将这些行为变为对儒者素质修养上的要求，而不再是糊口之术。

总的说来，儒者从根子上就是从事有关礼仪职业的，因此对礼仪一直十分重视。在孔子以前，他们对《诗》、《乐》，完全是作为操业的素质而学习的，对《书》、《春秋》也是出于掌握一些礼仪的依据而学习的，至孔子才继承周公的思想构建了儒家的理论框架。礼成为孔子挽回走向颓废的社会风气的理论和手段之一。

《仪礼》主要讲儒者所传西周的各种礼节仪式，难免被理想化和完备化，其中有的地方也吸收了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的仪节。它是孔子传授弟子的课程之一，也是儒家传习最早的一部书。《礼记》大部分是孔子的弟子、门人和儒家后学传习《仪礼》的“记”的汇集，即对《礼经》（包括汉以前已佚者）进行解说、补充和发挥的一些文献的汇集，包括孔子弟子所记孔子有关礼的言论和孔门相关的论文。这些论文原来多附于《仪礼》之后或单独流传。《汉书·艺文志》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钱大昕《汉书辨疑》言，“经七十篇”系“经十七篇”之误。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所流传关于《礼经》之《记》，几乎是《礼经》篇幅的八倍。而《经典释文》引晋代陈邵《周礼论序》曰：“戴德删古《礼》二百四十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

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据此,则西汉时所存关于礼的“记”篇幅更大,在当时所存《士礼》(即《仪礼》)的十四倍以上。

这些关于《礼》的“记”都是汉代形成的吗?不是。以今存《礼记》内容视之,有的问题在汉代已失去探讨的意义,那么多关于礼的问题在汉初的不长时间中也产生不出来;而且,其中一些篇章显然是先秦时代的,有的也有文献记载的依据。同时,汉初曾几次出土先秦时典籍,其中就有《礼》、《礼记》之类,应包括汉初的《记》百三十一篇。那么,今存《礼记》中的篇章应大多产生于先秦时代。但因为它们毕竟是“记”,不是“经”,历代传习之人,尤其是其中有较高学养,有一定声誉的学者,可能结合当时的情势,根据自己对古礼的理解进行新的解释和阐发,或对其中某些文字进行修改,或加进部分后代的东西,以适合于当时的情势。当然,今本《礼记》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前引陈邵《周礼论序》中那段话已反映出了大体的情况。因为人们在不同时代对所传书中一些具体内容的理解有同有异,所以马融等整理去其繁重之时,难免会因个人的看法而芟除一些他们认为出格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是严谨的学者,但作为一代经学大师,其所以能够成为一家,也同他们能顺应时势、因时立说有关。他们的整理说解、选择去取,总会体现着自己的思想。

今本《礼记》还将孔子弟子和孔门后学有关礼的一些论著编入其中。因为儒学至东汉时不仅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统治地位,而且已经成为理论体系相当完备的学术流派,所以郑玄、卢植等人对关于礼的各种记的汇编,除整齐内容之外,也就有补充缺佚的目的。他们希望尽可能全面地、完善地展示儒家关于“礼”的理论,所以,孔门弟子后学的一些相近著作皆被编入其中。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云:“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礼》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记”、“传”之义基本相同,只是“记”则更侧重于对以后所出现有关礼的问题的探讨与记述。从这点上说,专门研究有关礼的问题的论著与

“记”的性质相近。因此,曾子、子思、公孙尼子的著作也编入于其中,不为违例。

所以说,今本《礼记》中的篇章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也不是完成于同一个时期、同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它是春秋末年至秦汉之际关于“礼”的解说、补充文字和有关论文的汇编;虽然今本《礼记》是汉初所存这类著作中的一部分,但它仍然是一部积累起来的学术史。

不仅这样,《礼记》也是我国秦汉以前的一部社会生活史。因为《礼记》中记述的礼总是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相关,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交流相关,所记很多礼俗活动和日常起居、饮食存问中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亲疏关系、不同辈分、不同年龄的人的表现,祭礼、聘礼、燕礼、射礼、冠礼、婚礼、葬礼等各种典礼、仪式中的不同仪程,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同时,书中对《仪礼》的解释、发挥,总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出一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如《曾子问》一篇,其中问到一些十分特殊的情况下丧礼的仪节问题,就明显是从战国初至战国末,甚至到秦汉交际的礼学家就丧礼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解决办法的记录,很像今天的司法解释。当然它不是由国家有关部门所作,而是一般礼生求教于礼学大师或有较高水平、较高声誉的礼学家的讨论结果。这些东西长期流传,不断积累,成为篇章。从篇名看,有可能开头有几条是曾子问孔子所记,其部分篇章的作者和记述者应为曾子一派礼学家,而不可能全是曾子问孔子的记录。如果曾子真是这样挖空心思去想问题问孔子,那就真有些钻牛角尖,甚至如坏学生刁难老师一样,有些故意捣蛋了。所以说,就《礼记》全书而言,不具有共时性,而是历时性的,是在流动不居的过程中不断补充完成的。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先秦时代的社会生活史。

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的《易教》、《经解》等篇中提出“六经皆史”之说,认为《易》、《诗》、《书》、《礼》、《乐》、《春秋》原为三代史官记录“先王之政典”,其事包括“典章法制”、“政教刑事”、“人伦日用”,是圣人“因时而制”。这个说法对于明清时代以六经为训后世之圣典,万世不变的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虽然章氏的有些话说得太绝对,但他这个论题,道出了部分的真理,却是以往的经学家、史学家所未能

想到的^①。《尚书》、《春秋》不用说,《诗经》反映了长达千年左右的社会生活,《周易》反映了商周时代意识形态的状况,而《易》的产生发展更包含了我国从史前阶段到奴隶社会中后期形而上方面的发展状况。《仪礼》则更是具体地展示了西周、春秋时代政治生活,各种典礼、仪节的一般规程及国家之间、卿大夫之间、一般士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过程。记具体历史事件的“史”,只记其大概,而《尚书》则保留了同一些重大事件有关的文献,均如人之骨架。《诗经》、《仪礼》展示了生动的社会生活状况(前者展示个体的人对一些事情的感受与看法,后者则展示了社会活动进行的程序和当时的习俗、社会风气),就像人体的肌肉与血脉。如《祭义》篇云:“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只三十二字,对我国上古时代社会伦理和仪节的变化作了高度概括。

讲历史自然离不开重大的政治事件,但过去的所谓“正史”大部分是帝王的家族史和帝王将相的作为史,人民只作为与之有关的方面被涉及到。所以,几千年来人们的生活状况、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及在社会中的活动,很少得以集中的、较完整的展现。司马迁的《史记》在“本纪”、“世家”、“表”和人物“列传”之外,还写了《货殖列传》,在“八书”中,也颇涉及与人的生活有关的问题,班固《汉书》在“纪”、“传”、“表”及人物、民族、属国“列传”之外列了《食货志》、《刑法志》等,都是他们高于一般史学家的地方。但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史著作是政治史、军事史的结合。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加入经济的部分,有的还加进了文化方面的内容(如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的发展状况)。但总的来说,直至今日,作为构成社会主体的广大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不同阶层、不同类型和不同关系之间的人是怎样交往的,则一概看不到。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民的历史,却看不到人是怎样生存的;人们看到的仍然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过程。从统治阶层来说,《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公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要了解中国古代社

^① 王守仁《传习录》曰:“以事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说已发“六经皆史”说之端,而章学诚则于此作了系统论述。

会而只看到“戎”而完全忘却了“祀”及与之相关的礼仪,也是不全面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德国和意大利史学界兴起了一门新的历史学科,被称为“微观史学”,实即日常生活史。这个新兴的学科很快受到西欧史学界的重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标识性”的事件。我以为,中国古代的一些礼学著作,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关于礼学的“记”,都是十分宝贵的古代日常生活史文献,它弥补着所谓正史和准正史(无论是纪传体、编年体还是本末体)的不足。这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读《礼记》,可以知道古代有些什么礼俗,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积累了哪一些关于亲属关系、代际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他们是怎样协调各种复杂关系而达到家庭、亲属、社会的和谐的;他们是怎样从声音语言、体态语言、行事仪式上体现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的。读《资治通鉴》可以明政治、军事之大端,但很多大事有时也由细节引起,或决定于细节。《左传·宣公十七年》载晋郤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克腿跛,妇人笑之,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结果晋齐鞌之战中齐顷公几乎丧命。郤克有胆有识,德才兼备,一怒而雪个人之耻,张国家之威。但他的儿子郤锜和侄子郤犂却见利忘义,自以为是,郤犂聘鲁时求妇于声伯(成十一年),送孙林父于卫而傲(成十八年),取货于宣伯,诉季孙于晋侯(成十六年),与长鱼矫争田(成十七年);郤锜如鲁乞师而不敬(成十三年),与夷阳五争田,临难而郤攻晋侯(成十七年)。这些都不是大事,结果却造成郤氏的灭族之灾。可见无论于国、于家,一些礼节上的小事和平时的为人处事,都可能成为大事变的根源或导火线。

《礼记》在今天的价值,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人是如何生活的,秦汉以前国家之间、个人之间的交际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进行的,而且反映出一种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些人看韩国影片,为其中所反映的对长辈的尊敬、爱戴和几代人之间亲密而和谐的关系,朋友交际中的讲究诚信与礼节等等,深为感佩,殊不知这些本来就是儒家的文化传统,只是韩国仍然继承着这一些,而我们则在经过若干政治运动之后将它们抛弃殆尽而已。读《礼记》一书就可以明白,中华

民族不仅以吃苦耐劳、热爱自由、坚决反抗侵略而闻名于世,而且确实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礼仪之邦。比如《礼记·曲礼》中讲对待父母、长者应注意: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曲礼上》)

童子不衣裘、裳。(《曲礼上》)

从长者而上丘陵,则必乡(向)长者所视。(《曲礼上》)

《内则》一篇中集中讲事父母姑舅应该注意的事项,有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礼记》中也说到拜访亲友时应注意:

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

(《曲礼上》)

现在有些青年不敲门即推门而入或先在窗外探头探脑,这不仅显得不尊重别人,也显得不大方,有损于自己的形象,有时还会出现很尴尬的场面。如果“未上堂,声先扬”,主人即有机会使自己的衣着整齐一些,也对室内作最简单的清理,来郑重地接待你。书中还说:

毋侧听,毋噉应,毋淫视,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曲礼上》)

这是说注意举止,因为一个人的举止是一种体态语言,既表示着对于他人的态度,也反映着自己的修养。又说:

侍坐于君子,君子更问端,则起而对(郑玄注:离席对,敬异事也。君子必令复坐)。(《曲礼上》)

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曲礼上》)

在老师、长辈、首长面前,回答问题之时应该站起来;不要对方问话还没有说完就抢着回答;向先生请教,也应该站起来说,以示尊重。又说:“君子式(轼)黄发(按,指老人)”,“入国(指都城)不驰,入里必式(轼)”,这既有尊老、尊重邻里的意思在内,也有安全方面的原因。这同目下有些人开上小车横冲直撞,故意炫耀邻里的做法,大异其趣。又说: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视日蚤莫(暮)，侍坐者请出矣。(《曲礼上》)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间，愿有复也。”则左右屏而待。(郑玄注：复，白也。言欲少顷空间，有所白也。屏犹退也，隐也)。(《曲礼上》)

现在有些人拜访人，一坐几个小时不走，主人已表现出困倦之意，也似乎看不出，尽说些不相干的闲话；主人问几点了，意欲让其知时久而离开，他竟一点不懂。人家家中有事，进来给主人说：“有人找。”客人也毫不理会，照样谈自己的。这都是失礼的表现。又说：

离坐离立，毋往参焉。离立者，不出中间。(郑玄注：为干人私也。离，两也。按：通“俚”。孔颖达《疏》：若见有二人并立当己行路，则避之，不得过出其中间也)(《曲礼上》)

将适舍，求毋固。(黄幹云：谓凡求物于主人，毋固，毋必，随其有无)(《曲礼上》)

这些都是小事，但不能不知。《曲礼上》说到“侍食于长者时毋咤食”(咤食，谓以舌口中作声，似嫌主人之食)，“毋反鱼肉”(不要把自己已经用筷子夹起的又放回盘中)，“毋固获”(不要用筷子在盘中翻来翻去找自己想吃的东西)，“毋刺齿”。今天西方社会及日本、韩国等，都讲这一套。文中又说：“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为什么呢？因为当着客人的面喊：“狗，出去！”这可能让客人觉得是在指桑骂槐，不欢迎自己。给别人让食而唾，或出鼻涕，对着餐桌咳嗽，都会让人感到恶心。《少仪》论事长者应注意之事，也有不少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前几天看到报上有则消息，一位外国人在上海开了一个礼仪培训的学校，短期培训一些大企业的经理、董事长等。说中国一些老板同外国商人谈生意，吃饭张口大嚼，喝汤扑腾扑腾作响，筷子在菜盘子中随意拨过来拨过去，骨头餐巾纸随手往地上一摔，踩着骨头、垃圾走来走去，不以为意；交谈时也是披襟捋袖，侧首喷烟，缺乏起码的礼仪习惯，使外国商人大为吃惊。文明行为不是国家法令、制度所规定，违反了它，也不会受到司法部门的追究，最多也就是受一点罚，如随地吐痰，乱停车等。重要的是影响到个人和单位、甚至国家的形象，也可能

只是由于一些言谈举止的不文明,使对方产生不好的看法而坏了大事。我们在影视上看到,向长官禀报事情或是递文书,事后要退几步才转身;一些大公司的秘书向总经理、董事长之类递材料也是如此。古代的、国外的不说了,当今商界的白领怎么懂得这一套呢?自然,后面的是向前面的学习、取经的,但前面的又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一是听懂礼仪的人讲述一些传统礼仪或国外的礼仪,一是自己从生活中、工作中悟出来的。《礼记》中常常说到“君子”、“长者”。“君子”就是有地位的人,《礼记》中自然是指地位比较高的人,在社会实践中实际上也是相对而言,这里只能作灵活理解,而不能认为《礼记》中的道理只是讲给“小人”和青少年的。有些干脆没有接触过古代礼仪制度之类的青年、农民,在首长、大领导问到自己时,也会不自觉地站起来。所以,礼节方面的很多规程,并非哪些个圣贤所设计、规定,而是基于各种社会关系和人的心理变化自然形成的。《曲礼上》说:“赐人者不曰来取,与人者不问其所欲。”赠人东西而让对方来取,就有居高临下施舍的意思,即《檀弓下》所说的“嗟来之食”,是不尊重对方的人格。要赠人以物而问对方喜欢什么,这样做或使对方感到为难,不好说,或助长贪婪、勒索、贿赂之风。故宋代吕大临曰:“与人者问所欲,人之所难言也。”王安石曰:“为人养廉也。”《曲礼上》又说:“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吕大临曰:“责人厚而莫之应,此交之所以难全也。欢,谓好于我。忠,谓尽心于我。好于我者,望之不深,则不至于倦而难继也。……尽心于我者,不要其必力致,则不至于不能勉而绝也。”“尽人之欢,竭人之忠,则应之者难而交道苦矣,故君子戒之。”其中又说:“入境(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提出了人们在社会交际中的三条普遍原则,上至于官员使节,下至于经商、旅游者,都不应不知。还有些是属于生活常识的,如果不知,也会显得大模大样,对人不敬。如:“受珠玉者以掬,受弓箭者以袂。”因为受珠玉不以掬则有可能掉在地上,弄得双方大惊失色,如所损坏,则更会出现尴尬场面,甚至伤害感情。

《礼记》除了体现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反应之外,民族的伦理道德,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得到反映。比如《曲礼上》:

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

这实际上是春秋战国各国的常法。《管子·立政》中也说：“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舍。”《曲礼上》又说：

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卿大夫犹今之政府官员，士犹今之公务员。这当中实际上也提出了作为统治者和国家工作人员应有的荣辱观。《表记》云：

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

我们的政府官员、公务员、教师、医生、律师等等如果都能确立这种意识，我们的社会会更加美好。《礼器》中还提出：“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大传》还提出治天下应先者五事：“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这些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的社会，也很有参考价值。

《礼记》中有些文字看似平常，但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如《杂记下》云：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蜡祭是夏历十二月农闲之时民间祭农神的一种活动，乡人聚餐会饮，其热烈情况同近代农村中元宵节或唱会戏相似。子贡饱读诗书，对这种民间的活动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也不能理解何以老百姓都那样狂热、感兴趣。孔子告诉他，老百姓长年劳苦，行蜡礼以表示对明年良好收成的愿望，且有一日之燕乐，又感君之恩泽，才能保持长久劳作的热情。一直让人处于紧张的劳动中，连文王、武王这样的圣君也办不到；而一直让人们悠闲怠懈，无所事事，圣贤之君也不会这样做。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工农业生产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都证明了孔子这段话的深刻、透彻。

又《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

麋，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又云：“木不中伐（按：言小而未成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言小而不足食），不鬻于市。”如果我们今天也坚持这么作，对于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建设规划，会很有益处。

《曲礼上》还谈到遇邻居亲友有丧事时如何对待的问题。其中说：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紼不笑。

这实际上表现了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在无言之中表现出情感、心理的相通。这样做，任何一家经过一件大事，都会使其同周围邻居的关系进一步加深，绝不会引起心理的芥蒂和怨怒，更不会因为未考虑到邻里、亲朋的情绪而引起争吵与打架。

关于丧事，《礼记》中主张有事之家和吊唁者都应有一种真诚的哀悼之情，同现在一些人为了显示权势或钱财而大办丧事、大摆酒席、吆五喝六、大吵大闹的做法完全相反。《杂记下》云：

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

《礼记》一书虽然特别重视丧礼，但其基本精神是不忘亲恩，并不如汉以后特别是宋以后把守孝之礼弄得不近人情，使得虚伪做作的做法也滋长起来。《杂记》还记有孔子的一段话：“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可见孔子在丧礼上是比较通达的。

至于《礼记》中所论如何作人的道理，更是我们民族优秀品质的总结。如《曲礼上》云：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

贫者不以财货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

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孙希旦注后一条云：“教者德之凶，欲者情之私，志满则招损，乐极则必淫。四者皆害于性情学问之大者，克己者之所当力戒也。”上面这两条对于政府官员、各级公务员、企业及其部门的领导，都有很大教育意义。

《表記》引孔子之语云：